

在自嘲与反思间勘破小说密码

□陶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说界热衷于提倡“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写语言”成了一条理所当然的小说“艺术正确”。文本的“辨识度”，成了很多纯文学写作者的最大焦虑。黄孝阳轻松地碾碎这个虚拟的门槛，但却并不理会“艺术正确”，反而是大开大合地撞击很多“艺术正确”的禁忌。他擅长描写出各种“精分”的人物或者“爆裂”的情节，描写动优于描写静，描写混沌优于描写明晰，描写失序优于描写有序，描写混乱优于描写笃定。他一直强调自己要回归。可显然，他的长篇新作《人间值得》在碰撞现实的角度上走得更远。尽管他舍弃了一直颇具特色的大段落书写风格，但那份滔滔不绝的雄辩，真是潜入基因的特色。

《人间值得》书写了一个“当代英雄”的故事，一个“草根”出身的民营企业家长荒诞又真实的一生传奇。故事写得十分好看，近三十万字的作品，酣畅淋漓地书写了一个“恶棍传奇”，类似网络上打怪升级、迈向人生巅峰的

“创业流爽文”。但显然，他立足的是严肃文学方向书写，更加真实与深刻，更彻底与决绝。

主人翁名叫“张三”，出身优渥，但张三的行为处事完全没有“教养”的影子，反而更早就被扭曲。主人翁既拥有这种“二代”的身份，自己也充分认识权力的优势，能充分转变为对女性、金钱的不竭追求。取得第一桶金的成功后，之后的累进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作者肆意汪洋的笔下，人物都被推到了最极端的状态，无论男女主次，人物都充满着澎湃的激情，大开大合的爱恨情仇，赤裸裸的利益冲突。欲望、执念、意志、贪婪、算计，在叙事的猎枪里反复捶打。

的确有某种“浮世绘”和风俗画的感觉，但却是一种象征性的叙事表达。《人间值得》有两层世界，一个层面是“张三”的酣畅作恶世界，是一个“爽快”的层面，“他起先怀疑是什么怪物，但仔细看，又不像，分明是人的轮廓，但走路的姿势，有些像猿，佝偻着身体，异常灵活，有时低伏，有时雀跃。他愈发惊慌，猛地回头大喊：‘出来吧！如果要取我性命，尽管来吧！’”的确，房伟笔下的参谋长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跨时代的“同病相怜”。同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不正常”的狂人一样，参谋长“只想做个快乐的富翁，好好活这一辈子”的愿望在整个民族浴血奋战的大背景下也“不正常”。但作者并未以谴责的立场来叙述参谋长幽微的心理变化，而是借这一人物来说明个体生命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最为真实的写照。作者将骁勇善战的参谋长与自私怯懦的逃兵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角色融于一人，其实是在追问我们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眼光粗暴地审视历史态度的合理性。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他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中一个人像“人”而非政治符号的样子，虽然这个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除此之外，《起义》中希望带领队伍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师长，在重病濒死时为为了撑起起义的时机，警惕着周围，“像精明的老守财奴那样算计时间”；《鬼子妮》中从日本兵营中逃出的军医“山大爷”虽在中国娶妻生子本分生活，因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但哪怕战争结束，他尴尬的异族身份与血腥的战争历史纠缠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无根的人。

在房伟的写作语境里，“个人”不是无知无觉地被拍在河岸上蒸发的浪花，而是具有个体生命力量的“游鱼”，虽然对于改变历史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鲜活且真实。

在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中，“全景式”和“史诗式”的描写仿佛作为一种传统，到现在仍是很多作家无法解开的情结。但房伟则另辟蹊径，他开始以一种未曾亲历历史的身份严肃地回望历史。这种回望虽然秉持着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他并没有使其拘泥于史实，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而非刻意丑化或神化的思维，将战争历史推入更高价值的思考中。

除了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对话，小说集中还存在不同时空的并置。《回乡》描写了为了写出抗战历史的深度采访，解决编制问题的安心，回到故乡的红色堡垒村进行资料搜集。此篇小说采用了镶嵌式的叙述结构，在安心探访历史的过程中嵌入中学教员黄玲的日记内容指引安心与读者的真相探索，但最终现实生活与历史真相之间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暧昧隔膜。除了《回乡》、《白光》、《指南》、《五三》等作品也通过历史尘埃与现实生活的并置，表达了不仅是当代人在回望和重塑抗战记忆，抗战记忆同样也在重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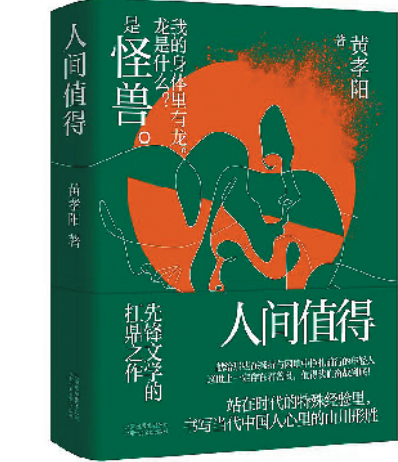
张三所游刃有余的现实世界，让读者感到绝望，张三游刃有余之外，是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自嘲、自我反思和绝望。

黄孝阳的写作，一直以来风格格特立独行，滔滔不绝却充满机巧的叙事，高密度的各类修辞，纤细入微的感觉描写，以及成块成块的“思想”山崩一样砸下来。这些，交错构成黄孝阳独特的叙事密码。不疯不魔不成活，所以，他把自己描绘成先锋文学的一只巨兽，身体内有一条龙。正如他一再津津乐道的，他要书写的是一锅“量子汤”。文字沸腾，喋喋不休，发动了他内心深处对“合理”的思考和摧毁；像《人间世》那样，书写新于连李国安对“官场小说”的嘲讽，像《阿黑历险记》那样对劣质儿童文学的戏仿，像《乱世》那样对历史无尽消解，甚至像《旅人书》那样干脆利索地对“小说叙事”本身引刀成一快。混乱乱，混乱乱。

《人间值得》无法归类于准小说的成长小说、商战小说、黑道小说或是黑幕小说，很像一部“黑色幽默”小说，却时不时地冒着热腾腾的情欲。用批评家的话，它“成妖”

或者“灾变”了。如果非要类比，《人间值得》或许是作家路遥那部鼎鼎大名的《平凡的世界》的镜像书写，是作者心路另一段“及物”的旅人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里“世界”有多么的励志与暖心，《人间值得》的“人间”就有多么的深寒与残酷。小说主人翁人物“张三”，几乎和孙少平、孙少安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成长。但不同的是，他绝不天真，从来就不准备用任何一丝的“不现实”来麻痹自己，他也仰望星空，但看到无数深渊，已经凝视深渊，却不跳入深渊，既然遭遇毒龙，索性变成毒龙。

“虚无”似乎是七零后一代作家颇为共通的母题，他们像是时代的红利，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待财富或欲望，口吻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心理的基调颇为一致。那是旅途中洞悉沿途奥秘的心态，与八零后怯懦的自恋、九零后“少见不怪”的“佛系”截然不同。因此，黄孝阳一直觉得“七零后”应该能成长为中国文学全新的中坚力量，我倾向于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勘破小说艺术的密码之后，如何面对虚无描一，至少《人间值得》和“张三”并没有找到一个可爱的答案。



人世间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值得”二字实在不易写。有句话说，法，有的人来到世界上，大闹一场然后离去”。但其实，在一个平凡的世界里，大部分人真的是光活着就耗尽了全部的力气，他们“闹”不起来，只有无尽的忍耐与承受。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期待在无尽的“不值得”之后，黄孝阳聚力书写那隐没未见、稍微即逝、吉光片羽的“值得”。

书语

为故乡的饮食立传

□黄孝纪

行年半百，自十八岁通过高考而离开乡村，在或近或远的城市学习和谋生已三十余年，吃过的饭菜也可谓多矣。只是许多时候，我总爱不自觉地将在嘴里嚼的滋味，跟残存在记忆深处的旧时故乡经验对比一番，终究还是觉得旧时故乡的粗糙饮食味道更好，便有一缕乡愁暗暗升起。

我的故乡八公分村在湘南山区，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还十分闭塞，交通不便。亦因此，这个上百户人家的村子，日常饮食所涉及的种种食材，几乎都是出自故乡自身的这方土地。那个时候，村庄除了种植粮食，红薯这两种主粮外，小麦、高粱、黍子、花生、豆子等杂粮也多，园土里的白菜、萝卜、辣椒、茄子、南瓜、冬瓜等四时蔬菜，品种就更加丰富。至于荤腥，猪是家家户户都养的，喂的是猪草和杂物，从猪仔养到出栏宰杀需要一年多时间，完全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鸡、鸭、鹅的养殖也很普遍，它们完全是处于一种散养状态，活力十足；村前的池塘众多，平素都养了草鱼、鲢鱼、鳙鱼、鲤鱼等家鱼，池水来自溪流或山泉，碧波荡漾；而在广阔的稻田，深深的江流和水圳，野生的黄鳝、泥鳅、鲫鱼、田螺、虾子、螃蟹等也十分常见。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取的食材，以如今的眼光看来，无疑是绿色无污染的。而在那时，村人的脑海里尚没有食材污染的概念，这一切食材的取得全是顺应着天道自然。

那时候，故乡人家的炊具也简单。煮饭用鼎锅，蒸饭用木甑或瓦钵。煮菜用的是小铁锅，配有木盖和长柄菜勺。这只小铁锅，也常用来炒豌豆、黄豆、花生、瓜子之类的应季土产，在夏秋晴好的日子，还会用来做烫皮。另有一只大铁锅用来烧水泡茶，蒸木甑饭、焖红薯、焖芋头、蒸馒头、蒸饺粑、做米豆腐等都离不开它。调味品也只有简单的几样：盐、辣椒灰、土酱油以及葱、蒜、香芹和姜。油则用的是自家熬的猪板油和打榨的茶油。一年中，绝大多数日子，灶里烧的是柴火，只有到了寒冬季节，才烧煤炭。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吃着母亲用这些天然的食材和简单的炊具烹制出来的粗糙却喷香的饭食度过的。

1969年，我出生，在家中排行最小，上面三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我自小就有一副天生的好胃口，自生不久，就因爱吃饭，得了个鼎鼎有名的小名。在故乡，我的这个父母是人人所共知的，除了我的外婆姐姐和老师，几乎所有人都这么称呼我，直到我成年后离开故乡。严格说来，我不曾挨过饥饿，虽然曾有很长的岁月，村里不少人家每到了农历四五月青黄不接之时就需要借米借谷，我家也不例外。只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三餐吃土豆煮腌菜汤果腹，让我很是厌烦，也愈发怀念诱人的米饭。好在缺粮的日子毕竟短暂，待小麦和早稻收割，肚中温饱便有了保证。以后随着分田到户，杂交水稻的推广，农田广泛增产增收，谷满仓、家有余粮、常年有饭吃的农耕盛况，终得实现。

仓廪实而知礼节。有了余粮的故乡人家，每逢四时八节，亲戚邻里之间多有礼尚往来，日子纵然简朴，却也过得有滋有味。而对于主妇们来说，制作各种风味小吃，展现手艺，更是有了物质保证。那时候，村里有不少雕屋，里面安装有将谷物捣成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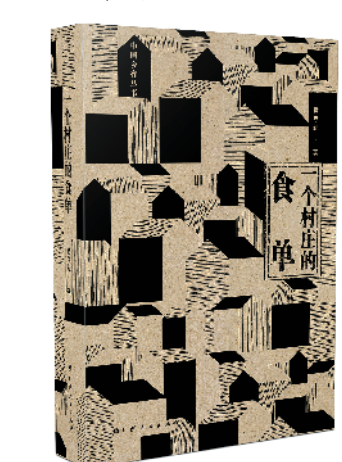
末的青石臼及配套装置，尽管原始而粗犷，用起来却也十分方便。一年四季，尤其是遇着节日或家中有喜庆，常有村妇端着浸泡过的黏米、糯米或高粱，带着簸箕、粉筛等一应什物，来这里耐心地捣粉筛粉，以制作诸如米饺粑、高粱饺粑、高粑、兰花根、套环、花片等种种美食。村子里专门制作豆腐、打糖的老工匠也不乏其人，他们的传统技艺让村人的生活更加丰富而多姿。

喜爱喝茶饮酒是故乡人的风习。村里人家，差不多都有喝早茶的习惯。在我们家，这种喝早茶的风气尤烈。每天早上起床，母亲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水，冲泡油茶。自然，茶叶也是母亲自己采制的，且品种多样，有正茶、枫树叶茶、山巷子茶、金银花茶、野菊花茶，全是来自故乡的山野林间。泡茶的铜茶壶造型精美，也是由乡村匠人手工打造，差不多是家里最贵重的器皿。佐茶的茶点，或简或繁，因时而而异，冬春的焖红薯、腌咸菜，夏秋的煨烫皮、炒花生，全是自家产物。热茶香浓，一家人围坐而喝，呼呼作响，津津有味。酒则是男子的杯中爱物，多为自家所酿。故乡人家日常所饮白酒，基本上都是红薯烧酒。到了临近过年的日子，各家则会酿糯米酒，或者用糯米酒液与红曲糖酒液，共同勾兑成一种名为胡子酒的混合酒。这种酒香甜，好入口，能不知不觉让人喝醉，在劝酒风气浓烈的春节期间，是宴席上待客的必备佳酿。

时光推移，世事演化。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传统农耕的乡村发生了深刻的剧变。影响所及，故乡的耕牛没有了，养猪的人家越来越少了，甚至鸡鸭鹅都少有养殖了。缺少了这些家畜家禽，供给农田园土的有机肥也少了，地力变得贫瘠，即便是有限的耕种，也依赖于农药与化肥，而这，又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急剧减少甚至灭绝。对于饮食而言，原先丰富的野生水生食材没有了，谷物和蔬菜的品种少了，各种肉食主要依靠从市场购买而来，且多来源于速生饲养场。以这样的食材制作的一日三餐，难怪又反过来让人勾起对以往生态环境及绿色食品的怀念。

再说，随着我们父辈们的逐渐衰老，随着那些磨坊、碓屋、榨油坊、豆腐坊的倒塌拆毁，许多传统食品的制作技艺和用具也随着消亡。那些曾经的美味味道，已经难以重现。即便模拟，也终究不及原先的地道风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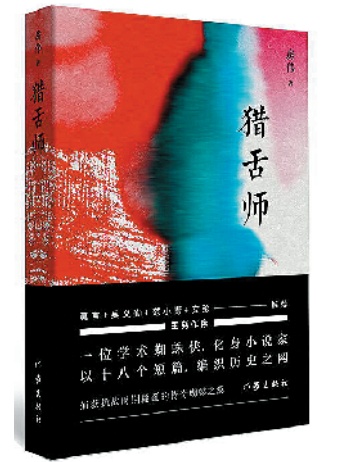
那么，就让这本小书做一个专门的尝试，以我的故乡村庄为一个点，截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陈列出一道道简朴的食单，细述一个粗茶淡饭的乡村日子，为故乡的饮食立传，留下那段真实的生活，记住那片难忘的乡愁。



微观

挖掘历史褶皱里的“隐私”

□郑姿靓



点，即战争中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与幽微心理。

小说集中刻画了多个与当时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的人物形象。在《花火》一篇中，带着3万元军饷当了逃兵的参谋长，在逃跑中疑似的模样仿佛《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他起先怀疑是什么怪物，但仔细看，又不像，分明是人的轮廓，但走路的姿势，有些像猿，佝偻着身体，异常灵活，有时低伏，有时雀跃。他愈发惊慌，猛地回头大喊：‘出来吧！如果要取我性命，尽管来吧！’”的确，房伟笔下的参谋长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谓跨时代的“同病相怜”。同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不正常”的狂人一样，参谋长“只想做个快乐的富翁，好好活这一辈子”的愿望在整个民族浴血奋战的大背景下也“不正常”。但作者并未以谴责的立场来叙述参谋长幽微的心理变化，而是借这一人物来说明个体生命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最为真实的写照。作者将骁勇善战的参谋长与自私怯懦的逃兵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角色融于一人，其实是在追问我们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眼光粗暴地审视历史态度的合理性。这个形象的价值在于他表现出了战争背景中一个人像“人”而非政治符号的样子，虽然这个人物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除此之外，《起义》中希望带领队伍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师长，在重病濒死时为为了撑起起义的时机，警惕着周围，“像精明的老守财奴那样算计时间”；《鬼子妮》中从日本兵营中逃出的军医“山大爷”虽在中国娶妻生子本分生活，因为“不想杀人，也不想被杀”，但哪怕战争结束，他尴尬的异族身份与血腥的战争历史纠缠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无根的人。

在房伟的写作语境里，“个人”不是无知无觉地被拍在河岸上蒸发的浪花，而是具有个体生命力量的“游鱼”，虽然对于改变历史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鲜活且真实。

在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中，“全景式”和“史诗式”的描写仿佛作为一种传统，到现在仍是很多作家无法解开的情结。但房伟则另辟蹊径，他开始以一种未曾亲历历史的身份严肃地回望历史。这种回望虽然秉持着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他并没有使其拘泥于史实，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而非刻意丑化或神化的思维，将战争历史推入更高价值的思考中。

除了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对话，小说集中还存在不同时空的并置。《回乡》描写了为了写出抗战历史的深度采访，解决编制问题的安心，回到故乡的红色堡垒村进行资料搜集。此篇小说采用了镶嵌式的叙述结构，在安心探访历史的过程中嵌入中学教员黄玲的日记内容指引安心与读者的真相探索，但最终现实生活与历史真相之间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暧昧隔膜。除了《回乡》、《白光》、《指南》、《五三》等作品也通过历史尘埃与现实生活的并置，表达了不仅是当代人在回望和重塑抗战记忆，抗战记忆同样也在重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

在房伟的写作语境里，“个人”不是无知无觉地被拍在河岸上蒸发的浪花，而是具有个体生命力量的“游鱼”，虽然对于改变历史显得微不足道，但他们鲜活且真实。

在众多历史题材小说中，“全景式”和“史诗式”的描写仿佛作为一种传统，到现在仍是很多作家无法解开的情结。但房伟则另辟蹊径，他开始以一种未曾亲历历史的身份严肃地回望历史。这种回望虽然秉持着一种尊重历史的态度，但他并没有使其拘泥于史实，而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而非刻意丑化或神化的思维，将战争历史推入更高价值的思考中。

除了同一时代背景下两种文化的对话，小说集中还存在不同时空的并置。《回乡》描写了为了写出抗战历史的深度采访，解决编制问题的安心，回到故乡的红色堡垒村进行资料搜集。此篇小说采用了镶嵌式的叙述结构，在安心探访历史的过程中嵌入中学教员黄玲的日记内容指引安心与读者的真相探索，但最终现实生活与历史真相之间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暧昧隔膜。除了《回乡》、《白光》、《指南》、《五三》等作品也通过历史尘埃与现实生活的并置，表达了不仅是当代人在回望和重塑抗战记忆，抗战记忆同样也在重塑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

一周书榜 (本周书单由学而优书店之中整理提供)

4.《共有的习惯：18世纪英国的平民文化》 [英]E.P. 汤普森

1.《痛苦的正当尺度：工业革命中的监狱：1750-1850》 [加]叶礼庭

本书通过丰富的历史细节生动再现了一个世纪内监狱生活的变迁，深度剖析了约翰·霍华德、杰里米·边沁等人的刑罚思想和监狱改革措施，从而解释了规制监狱内部权力运作的现代化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此外，针对监狱权力及其背后的强迫性思想结构，针对权力的道德边界，叶礼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2.《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美]蒂莫西·斯奈德

《民族的重建》对东欧民族演化中的微妙性、复杂性和重重矛盾做了精彩的、引人入胜的分析。跨越四个世纪、四个国家，通过将目光落在有着复杂民族混居背景、经历过极其多元的政体模式、被过度撕裂乃至摧毁的土地上，斯奈德试图为我们揭示民族理念转变的奥秘，追踪概念如何被解释、扭曲、发明和滥用，如何在与更为复杂的外部力量相互衍生的过程中酿成

3.《伊斯坦布尔三城记》 [英]贝塔尼·休斯

的笔调，探索这座“世界之都”，如何在长达近千年的历史光阴中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探究它如何在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的交融影响下，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特质。正如法国将军拿破仑所说，“如果世界是一个国家的话，伊斯坦布尔必定是它的首都”。经由这一本书，我们将重新理解，什么是“世界性”，以及，作为世界公民的我们自己。

5.《单读·十周年特辑》 吴琦 主编

2019年是《单读》书系创办的第十年，《单读·十周年特辑》是过去时光的答卷，也是未来岁月的开篇。这套纪念版《单读》，汇集了十年来重要作者的原创文章，以及国内外的新人新作，它集中展示了这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痛点和问题意识，代表着第一代中国作家看待世界以及中国本土社会的历程。

热点

混杂语境下的碎片化写作

这种概括相当精准，尤其是在这由116个片段组成的书中尽显无遗。从体裁上说，本书包容了短篇小说、历史小说、散文、信件等多种形态；从内容上说，跨越了历史、现代生活、医学、物理、女性主义、心理学、神话；从风格上说，不仅保持了托卡尔丘克一贯的神秘梦幻和诗性的特质，并且融入当代生活实景，尤其是解剖学和生物标本史上的进展，还增加了之前几本小说中少见的思辨性段落，风格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一次，托卡尔丘克将人类在地球表面的探索和在人体内部的探索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人性与宇宙的复杂和多样。

《云游》是她的第六本小说，跨越了文体、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界限，每一个章节各不相同，如同星星散布，但共同存在